

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

迈克尔·贝尔、许和意、卡尔帕纳·科赤哈尔 合著
与马军、西蒙·恩奎安巴、拉吉夫·拉尔

朱忠、段继宁、王志芳、温宇峰 合译
程辉、康强、冼卫红、梁惠江

朱忠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

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

迈克尔·贝尔、许和意、卡尔帕纳·科赤哈尔
与马军、西蒙·恩圭安巴、拉吉夫·拉尔 合著

朱忠、段继宁、王志芳、温宇峰
程辉、康强、冼卫红、梁惠江 合译

朱忠 校

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

(京)新登字 142 号

责任编辑:许小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门槛上/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staff of IMF)著;
人民银行总行基金处译.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10

ISBN 7-5049-1331-0

I. 中...

Ⅰ. ①美...②人...

Ⅱ. 经济体制改革—概论—中国

IV. F12

出版: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街3号

邮编:10005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国家统计局印刷厂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5.5

字数:145千字

版次:1994年9月第1版

印次: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2.00元

序 言

本期的不定期论文全面回顾了中国 1978 年以来的改革经验。文章指出了可能影响中国实施改革的能力的一些特殊情况，指出了它们对指导中国今后的改革战略的影响。

这篇文章是以作者们在 1992—1993 年起草的一些研究论文为基础写出来的。迈克尔·贝尔、许和意、卡尔帕纳·科赤哈尔和西蒙·恩圭安巴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亚洲部的工作人员；拉吉夫·拉尔是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马军是 1992 年的暑假实习生。科赤哈尔女士和贝尔、许二位先生汇总了材料。有关地区政策的主要工作，包括统计分析，是由马先生做的，而拉尔先生和恩圭安巴先生则分别提供了非国有部门和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两方面的材料，作者们要感谢堀口雄助、大谷一郎和道格拉斯·斯哥特先生提供的宝贵意见和支持，感谢凌明尹在研究方面提供的帮助。对外关系部的艾莎·雷和艾林·克诺特编辑了手稿并且协调了本文的出版工作。

文中所表达的意见都是作者们自己的意见，而不应理解为代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执行董事们或者中国当局的观点。

中国省、市、自治区名缩写表

AH	安徽 ^①	JX	江西 ^①
BJ	北京 ^①	LN	辽宁 ^②
FJ	福建 ^②	NM	内蒙 ^③
GD	广东 ^②	NX	宁夏 ^①
GS	甘肃 ^①	QH	青海 ^①
GX	广西 ^②	SA	陕西 ^①
GZ	贵州 ^①	SC	四川 ^①
HA	海南 ^②	SD	山东 ^②
HB	湖北 ^①	SH	上海 ^②
HE	河南 ^①	SX	山西 ^①
HI	河北 ^②	TJ	天津 ^②
HL	黑龙江 ^③	XJ	新疆 ^③
HN	湖南 ^①	XZ	西藏 ^③
JL	吉林 ^③	YN	云南 ^③
JS	江苏 ^②	ZJ	浙江 ^②

①内陆省、市、区。

②沿海省、市、区。

③沿边省、区。

目 录

序言	(6)
第一章 总论	(1)
改革的政治	(1)
概念框架的演变	(2)
改革的几个阶段	(2)
第一阶段 1978—84 年	(2)
第二阶段 1984—88 年	(3)
第三阶段 1988—91 年	(3)
第四阶段 1992 年到现在	(3)
中国改革办法的突出特点	(3)
第二章 中国改革开始时的情况和特征	(5)
改革开始时的情况和改革环境	(5)
宏观经济与体制情况	(5)
国内储蓄	(5)
获得外部资金的情况	(8)
经济的开放程度	(8)
改革的特征	(8)
地区政策	(8)
权力下放及其影响	(9)
企业所有权	(10)
农村的土地使用制度	(11)
专栏一 中国的非国有产业部门	(12)
专栏二 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	(13)
第三章 国内经济的改革	(14)
1978 年到 1992 年初的主要改革	(14)
农业	(14)
乡镇企业	(15)
价格与指令性计划	(15)
国有企业	(16)
就业、社会福利和住房	(17)
财政改革	(17)

金融部门	(18)
银行体系	(18)
非银行金融机构	(18)
证券市场	(18)
货币政策工具	(19)
改革的扩展：1992 年及以后	(19)
法规建设	(19)
政府的作用与职能	(22)
宏观经济管理	(22)
建立市场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22)
价格改革	(23)
农业	(24)
企业改革	(24)
企业条例	(24)
股份制	(24)
企业集团	(25)
亏损企业	(25)
剩余劳动力与发展第三产业	(25)
就业、社会保障和住房	(26)
土地使用制度	(26)
金融改革	(27)
非国有部门	(27)
专栏三 改革大事记，1992 年——93 年 7 月	(20)
专栏四 企业条例	(24)
第四章 对外开放和对外政策	(28)
全国性的政策	(28)
贸易制度	(28)
外汇制度	(29)
地区性的政策	(31)
经济特区	(31)
最早的经济特区	(31)
海南经济特区	(35)
沿海开放城市	(36)
浦东新区	(37)
内陆省份	(38)
进程回顾	(38)
专栏五 外汇留成和外汇调剂中心	(32)
专栏六 开放对经济的影响：若干特征	(39)

第五章 权力下放和地区开发	(40)
政策方向：产业政策还是地区政策？	(40)
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41)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42)
财政关系	(42)
信贷政策	(45)
对外政策	(46)
广东的经验	(48)
广东是增长最快的地区吗？	(48)
广东开发的若干特征	(48)
出口的作用	(48)
外国投资和毗邻港澳	(48)
同中央的财政关系	(48)
改革试验区和开放政策	(49)
广东经验能照搬到其他省吗？	(49)
内陆省份	(49)
边境省份	(49)
沿海省份	(50)
结论	(50)
第六章 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51)
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51)
增长	(51)
农业产出	(51)
工业	(51)
收入分配	(52)
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53)
背景	(53)
外贸与投资的趋势	(53)
一体化程度的评估	(56)
权力下放和宏观经济政策	(57)
财政政策	(57)
货币政策	(58)
对外政策	(58)
宏观经济管理与稳定	(58)
背景	(58)
周期	(59)
第一个周期：1979—82 年	(59)
第二个周期：1984 年至 1986 年初	(60)

第三个周期：1986 年中至 1988 年末	(60)
第四个周期：1991 年末至今	(60)
对周期的理解	(62)
推进市场型宏观管理的体制改革	(64)
金融部门	(64)
企业改革	(64)
财政改革	(64)
对外部门政策	(64)
第七章 结论	(66)
附录	(68)
一 1978 年以来的改革提要	(68)
二 各省的情况：统计分析	(75)
表格	
第二章 1. 若干宏观经济指标	(6)
2. 若干国家的债务与债务还本付息指数	(7)
3. 若干经济 1960—76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8)
4. 固定资产总投资	(10)
5. 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11)
第三章 6. 按固定价格、指导价格和市场价格计算产出与销售的比例	(23)
第四章 7. 1991 年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基本指标	(29)
8. 经济特区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若干指标	(30)
9. 经济开放区的所得税鼓励措施	(34)
10. 经济开放区的鼓励措施	(35)
11. 各国税率比较	(36)
第五章 12. 1988—92 年中央和地方的资源分享合同	(43)
13.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	(44)
14. 1991 年广东省境内外国投资的来源	(49)
第六章 15. 按所有制形式分的工业产出总值	(53)
16. 对外部门指标	(54)
17. 按主要出口商品群划分的外贸	(55)
18. 若干宏观经济指标	(59)
19.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61)
20. 若干近期经济指标	(63)
附录二	(75)
A1. 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解，1978—90 年	(77)
图	
第四章 1. 汇率变化情况	(33)
第五章 2. 省一级的所有制机构	(41)

	3. 1990 年省一级的预算执行情况	(45)
	4. 1990 年省一级的货币与信贷运行情况	(46)
	5. 1990 年地区对外发展情况	(47)
	6. 收入和消费的地区性不平衡	(50)
第六章	7. 若干经济指标	(52)
	8. 若干经济区域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56)
	9. 若干经济中的实际有效汇率	(56)
	10.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	(57)
	11. 中国开放度指标	(57)
	12.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60)

本书中使用下列符号：

...表示该项数据无法得到；

—表示该项数据为零、不足所示最末一位数的一半或该项数据不存在；

年份或月份之间的“—”（例如，1991—1992 或 1 月—6 月）表示所跨的年份或月份，包括起始年份（月份）和终止年份（月份）；

年份之间的“/”（例如，1991/1992）表示一个农业年度或一个财政年度。

“Billion”表示十亿。

分项数据与合计数据之间的微小差异是由四舍五入所致。

本书中使用的“国家”一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指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意义上的领土实体；这一词也包括一些并非国家的领土实体，它们分别单独地保存并向国际上提供统计数据。

第一章 总论

1949年革命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奉行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其基础是自立更生,主要靠行政手段由中央指导关键部门的资源分配。70年代后期,尽管大多数的政治的与经济的机构仍然原封不动,但中国的决策者们认识到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大检修。中国一方面维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整体框架,同时采取了一种开放贸易和发展同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联系的政策,并开始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在进行这些改革的时候,中国逐渐地放松了指令性计划,下放了经济决策权,并且让市场力量影响为数愈来愈多的价格。中国还允许非国有部门发挥较大的作用,并开始改造那些对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制度和机构。

在很大程度上说,改革的进行并没有详细的蓝图,总的说来是按一种渐进的试验的方式进行的,这和东欧以及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所采取的“大刀阔斧”的作法形成了对比。早期的改革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措施,选择一些部门和地区进行试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局部改革作法产生了各种矛盾,使中国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进行全面改革是必要的。

本章对改革进程讲了一个总的看法,包括对若干政治促成因素的看法,还大体上介绍了改革的阶段。第二章回顾了改革开始时的经济情况,考察了改革时期的经济环境的特征。第三章讨论国内改革,包括最近采取的把经济改造成完全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经济的一些措施。第四章详细介绍了向外界“开放”的进程。第五章考察了在改革过程中因下放权力而影响各省的业绩的因素。第六章评估了改革对经济结构和对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度的影响,这一章还考察了改革对宏观经济管理与稳定的影响。第七章包含一些结论性意见。

改革的政治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进程的时候,刚刚摆脱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极左派^①被温和力量的联合阵线赶下了台,温和力量由共产党的高级资深党员和文化革命时期出现的年轻干部组成。在头几年,领导党的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他主张在政治与经济制度方面尽可能不要偏离毛的信条。党把力量集中在恢复政治秩序和重新搞活经济方面,办法是恢复50年代初的那些政策。经济又部分地恢复了中央集权,并且加强了计划机器,推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十年发展计划,其中心是重工业投资和依靠资本设备的进口。但是这个计划不到两年就流产了,因为资本或进口猛烈增加,造成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困难。

到1978年后期,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派观点已经在党内处于支配地位。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3次全体会议上,领导层果断地同文化大革命的遗产决裂,并且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来,中国的主要矛盾被确定为经济落后同人民群众的需要的矛盾。因此,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②为此目的,新的领导层着手改革经济体制中那些妨碍经济发展的方面。

然而,虽然新的领导层一致认为要和过去决裂,要改革经济体制,但在改革的速度和性质方面看法并不一致,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和计划各起何种作用看法不一致。保守派主张在经过改革的经济体制中保留计划的中心作用;而比较激进的人

^① 人们称之为“四人帮”。

^② 在毛领导下主要矛盾规定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因此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认为要大大削弱和改变计划所起的作用。在开头几年,这种看法上的分歧没有多少政治含义,因为实行的改革都是试验性的和局部的,主要方向是重新搞活经济,由于多年的政治干扰和行政性的计划体制效果越来越差,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然而,随着改革开始向整个经济扩展,局部改革的不适当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周期性地出现宏观经济不稳定,结果,由于比较全面的改革办法已经成为一种迫切需要,看法上的分歧开始对政策的方向和实质直接发生影响,政策的重点出现周期性转移,但是较为激进的看法虽然有时受挫,但在1978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上风。1992年,思想上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党接受了高级领导人邓小平的看法,并要求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概念框架的演变

尽管15年来中国成功地实行了改革和开放战略,但改革并不是按一个全面的蓝图进行的。一般地说,改革措施首先是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通常是地方主动提出的),在地方试点成功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这种务实的改革作法有助于避免大的经济破坏,有助于把经济从中央计划占统治地位的制度转变到市场机制起重要作用的制度。^①

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问题是:市场制度是什么性质,这样一种制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的作用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在改革过程的开始阶段,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市场看成是对计划为主体的经济的一种有益的补充。^② 80年代中,市场的作用升级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按照这种说法,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能够把计划与市场力量的运用结合起来的经济制度。^③

人们正是应该根据这个背景,来认识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的重要性。该党总结了前15年的经验,接受了邓小平的论点,即市场机制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社会制度的定义性特征;只要生产资料的公共部门(包括国营部门和集体部门^④)所有制占统治地

位,就保持了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完全可以兼容的。根据这种新的说法,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经济体制,在其中,市场力量在国家的宏观经济影响之下决定相对价格和资源的配置。这种新的说法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因为消除了领导层在指导改革方面的矛盾心理,从而可以采取较为大胆的政策来实现建立市场经济的既定目标。

改革的几个阶段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分成几个阶段展开的: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第二个阶段是1984—1988年;第三个阶段是1988—1991年;第四个阶段开始于1992年。在早期阶段,改革的力量集中在搞活经济和克服毛的一些主要信条的不利影响,那些信条在改革前2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领导层看来,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1. 高度怀疑市场体制;2. 平均主义和依靠集体力量,对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极坏的影响;3. 从中央到省到公社都奉行了一种极端自立更生的、接近闭关自守的政策,虽然毛泽东非常讨厌官僚主义,但他怀疑市场体制,从而陷入了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协调那无数的经济活动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他曾试图用下放计划的管理体系和在地方一级提倡自立更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个人的积极性得到容忍,但受到严格管理。

第一个阶段(1978—84年)

最初执行的政策和60年代初为恢复大跃进之

① 这种务实作法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人们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

② 对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认识往往被说成是“鸟笼经济”论,这种理论是由党的元老陈云提出来的。按照这个比喻,市场是鸟,计划是笼子。笼子可以扩大,让鸟有较大的自由,但没有笼子,鸟就会飞走,这等于是说市场无秩序。

③ 按照这种看法,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被表述为“国家控制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有关这个理论框架的论述请参阅赵紫阳(1987年)的报告。

④ 集体基本上是乡村一级或者城市的街道一级的社区。

后的经济而采取的政策相类似。^①那时的政策比较地注重物质刺激，允许市场发挥较大的作用。特别是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鼓励农作物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放松了对农村市场（集市贸易）的各种限制，农业的组织形式也从集体分散到农户，在工业方面恢复了奖金制度，允许企业保留折旧资金，并对国有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对经济特区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以期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促进出口，并把这些特区办成大胆进行市场导向改革的试验场所。

第二个阶段（1984—88年）

最初的农村改革成功了。当局受到鼓舞，于1984年采取了广泛的措施来改革城市工业部门。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双轨价格制度；实行对企业征税的制度；改革工资制度，在报酬和生产率之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打破单一的银行体制，建立了中央银行。改革了投资体制，鼓励企业从银行系统借款来为项目筹措资金，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国家。修改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收入分享制度，让地方留有较大比例的财政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放开了沿海14个主要城市的外贸和投资。1986年，这些措施中许多都经过了修改和扩充，包括建立买卖留成外汇的外汇调剂中心，建立地方外贸公司以下放外贸权，对企业实行了与农业承包责任制相类似的承包责任制。

第三个阶段（1988—91年）

1988年中到1991年这段时期是一个紧缩时期。过去实行的改革在刺激需求与生产方面是成功的，导致了通货膨胀上升，1988年初，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两位数。新一轮的价格改革计划推迟了，早先实行的一些改革有所逆转，在“治理整顿”期间再度集中控制价格，此间当局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抑制已经过热的经济。紧缩计划在控制价格方面是成功的，但引起了生产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生产急剧减速。结果，国有企业亏损猛增，企业间债务增加，库存积压，很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为了避免隐约可见的经济危机，当局于1990年末求助于刺激性的货币与投资政策，以恢复经济的

活力。做为对这种政策态势的变化的反映，经济于1991年开始复苏，在后面这段时间，当局利用物价普遍稳定的形势，大幅度调整了比较价格，并且放开了某些价格。

第四个阶段（1992年到现在）

1992年初，当局宣布治理整顿结束，宣称自己有意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个进程于1992年10月达到顶点，这时共产党正式接受了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意见，即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不相矛盾，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说法代表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当局着手制定建立完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全面计划铺平了道路。1992年3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删去了计划经济的提法，并庄严地把建立市场体制这个新目标写进了宪法。其他的重要举措包括加速执行开发法规框架的工作计划，以支持市场经济，决定对政府的作用和职能进行重大的改革，计划加快企业、金融与社会方面的改革。

中国改革办法的突出特点

人们常说，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特点是逐步的和渐进的，同东欧及前苏联各国进行的改革形成对照。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时政治环境不同所致。前面说过，虽然中国就在开始改革之前两年发生过一次政治危机，但共产党原封未动，党内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这个阵线在进行改革的愿望上是统一的，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中国领导层的目的不是要改造整个政治经济制度，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和现存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内尽可能快地发展中国的经济。

过去15年内进行的改革有哪些突出的特点呢？一般地说，改革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在中国的决策者们看来，逐步进行改革的办法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避免对经济的重大破坏，如果政策有缺陷，可以根据全国的和各地的

^① 参阅里斯金（1987年）的著作。

情况进行修改。第二,先实行那些很可能成功的政策,领导层就可以逐步取得对继续改革的政治支持。这对于避免社会动乱和政治冲突尤其重要,而社会动乱与政治冲突可能使整个改革进程脱轨。第三,要使一些改革卓有成效,需要建立起新的机构,要建立起新的法规框架,要训练人员使其熟悉新的作法,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第四,在新的制度发生效力之前可以继续利用计划制度的管理机器——尽管这些机器的效用日见减弱。

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用中介机制来消除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之间的过渡障碍,以避免从一种制度突然地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可能造成的重大破坏。具体例子有:建立双轨定价制度,以改进资源配置;建立外汇留成的调剂市场,以改善外汇的使用情况;建立开放经济区以引进外资和技术;应用承包责任制以鼓励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接近市场行为;准许一些地方政府颁布和试验一些市场导向的法规;下放决策权力以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使用中介机制可以说是一种鼓励经济单位在最终取消计划体制之前逐渐改变其行为的一种办法。而且,改革是相互联系的,要使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充分发挥效用,就要同时实行所有的改革。而中国的经验和知识有限,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例如,要建立完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就要实现价格体制的合理化,要加强对企业的预算约束,要实现国有银行商业化;如此等等。

中国改革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领导层试图保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当局没有像东欧和前苏联一些转轨经济那样,实行一种大众私有化战略。但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局限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控制战略部门和让非国有部门与私有制起辅助作用,因而减少了坚持社会主义可能对改革造成的压制。这个经过修改的定义使当局有颇大的余地来实行那些推动市场体制发展的政策,例如使用物质刺激。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土地继续公有,但其使用与管理承包给了个体农户。强调“所有权”,当局就可以进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变革,割断企业与国家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财务与管理方面的联系,以期把企业改造成自主的、自负盈亏的单位。^①新框架

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实行了非常成功的推动非国有部门发展的政策。非国有部门的定义包括集体企业、个体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非国有部门的迅速成长加强了整个经济,也有利于改造传统的国有部门。

到目前为止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一个重要伴随物是逐步下放经济决策权。事实上,下放决策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改革进程的某些方面——突出的是农业和对外部门——但也使改革的其他方面复杂化了,特别是如何在一个市场导向性较强的环境中用间接手段实行需求管理。尽管权力下放在改革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反复讲的话题,但目前的进程与过去不同,深度不同,广度也不同,而且它是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用的。计划的管理机器早就已经移交给了地方当局,但1978年以来的权力下放走得远得多,割断了经济行为人同国家的关系,让经济行为人根据市场信号进行决策,给予地方政府以很大的资源配置自主权。这本身就成了一个能自我维持的进程,因为地方当局利用越来越大的自主权,加强自己在同中央谈判资源共享时的地位以及在投资等领域的地位。

局部改革的做法,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经济经历了一些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停停走走”周期,因为当局取消了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而间接手段又因改革不配套而仍然难以发挥效用。随着权力下放的进行,传统的、行政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效用已经下降了,因为地方当局和国有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在一个相对薄弱的财务纪律框架内就会追求自己那些比较狭隘的发展与增长目标。结果,宏观经济不稳定倾向于一个周期比另一个周期严重。到目前为止,当局每次都是依靠把经济政策措施和直接行政干预结合起来的办法,重新取得了对经济的控制权,但这种作法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点从1988—1989年那个周期看得很清楚。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今后很可能仍然是关键性挑战之一,即使当局在改革的最后阶段采取措施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① 第三章详细叙述了迄今为止的企业改革。

第二章 中国改革开始时的情况和特点

本章回顾改革开始时的若干经济情况和改革期间的经济环境的若干特点，突出讲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些特点。这同理解改革的影响，对比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前中央计划经济的经验，关系十分密切。

改革开始时的情况和改革的环境

宏观经济与体制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先是选择了苏联式的“指令”经济模式来指导发展战略，但中国领导人及时地越来越看清了这个模式的某些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高度集中这一点。中央计划机器在1957年进行了大检修，中央政府保留了对重要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控制权，但把对其他企业特别是从事轻工制造的企业的控制权交给了地方当局。虽然在1978年以前各个时期的中央控制也是时紧时松，但中国从来没有把中央计划恢复到前苏联及某些中、东欧国家搞的那种集中程度。

1978年以前25年中奉行的发展战略的经济遗产是什么呢？尽管在大跃进（1958—1959年）之后出现了萧条和饥荒，后来又有文化革命的政治动荡，但中国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还是实现了平均每年6%的增长率（表1），虽然起伏很大。统计上的通货膨胀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很低的，很少出现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或者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以电力、水泥、钢材的产量来衡量，中国在70年代末的工业基础，可以同日本与苏联60年代的工业基础相比，而中国在收入分配与社会指标方面的纪录，则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好。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30年中是讨厌对外借款的，因此在进入改革时期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外债。^① 这同东欧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对比，那些国家对外借款比较多，而且主要是用于消费和低效投资（表2）。简单地说，

中国的经济不同于其他过渡中的前中央计划经济，在实行改革之前没有陷入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深重危机之中。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改革及其规模的促成因素是什么？

虽然在宏观经济这个层次上没有什么危机，但人们对制度越来越不满，农村地区尤其如此。1978年以前的有记录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量，总要素生产率很少或者没有增长。还有，产出增长大起大落，主要是因为权力时而集中，时而下放。经济面临着长期的、基本的经济困难，许多困难与其他中央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相类似：包括定价制度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投资集中于重工业而牺牲了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形成了各种瓶颈制约因素；农业生产停滞，非粮食产品短缺；没有外部竞争，普遍地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人均消费增长缓慢，许多消费品和住房严重短缺。

中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的经济增长比几个东亚邻国的低得多（表3）。而且，由于前30年实行的基本上是闭关自守制度，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很少取得技术进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除非有效地消除中国与其邻国的技术差距，否则，产量方面的差距只会扩大。

国内储蓄

成功地改造经济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有资金可用于进行调整和发展经济而又不引起通货膨胀。自改革开始以来，中国有国内储蓄率很高的优势——估计为30—35%。^② 这种储蓄率比大多数发展

^① 1978年的外债总存量估计占出口的12%（参见程（1982年）文章）。

^② 这些数字须小心看待，因为在衡量中国的储蓄方面存在严重的概念与实际方面的问题。

表 1. 若干宏观经济指标

(除另有规定者外均为年度百分比变化)

	实际净物质产品 ^①	一般零售价格	政府预算余额 ^②	出口 ^③	进口 ^③	贸易余额 ^③
1952	...	...	1.3	0.8	1.1	-0.3
1953	14.0	3.4	0.4	1.0	1.4	-0.4
1954	5.8	2.3	2.2	1.1	1.3	-0.2
1955	6.4	1.0	0.3	1.4	1.7	-0.3
1956	14.1	—	-0.2	1.6	1.6	—
1957	4.5	1.5	0.7	1.6	1.5	0.1
1958	22.0	0.2	-1.9	2.0	1.9	0.1
1959	8.2	0.9	-5.3	2.3	2.1	0.2
1960	-1.4	3.1	-6.7	1.9	2.0	-0.1
1961	-29.7	16.2	-1.1	1.5	1.5	—
1962	-6.5	3.8	0.9	1.5	1.2	0.3
1963	10.7	-5.9	0.3	1.6	1.3	0.3
1964	16.5	-3.7	—	1.9	1.5	0.4
1965	16.9	-2.7	0.5	2.2	2.0	0.2
1966	17.0	-0.3	1.0	2.4	2.2	0.2
1967	-7.2	-0.7	-1.5	2.1	2.0	0.1
1968	-6.5	0.1	0.1	2.1	2.0	0.1
1969	19.3	-1.1	—	2.2	1.8	0.4
1970	23.3	-0.2	0.7	2.3	2.3	—
1971	7.0	-0.8	0.6	2.6	2.2	0.4
1972	2.9	-0.2	—	3.4	2.9	0.5
1973	8.3	0.6	—	5.8	5.2	0.6
1974	1.1	0.5	-0.3	6.9	7.6	-0.7
1975	8.3	0.2	-0.2	7.3	7.5	-0.2
1976	-2.7	0.3	-1.2	6.9	6.6	0.3
1977	7.8	2.0	1.1	7.6	7.2	0.4
1978	11.7	0.7	0.3	9.8	10.9	-1.1
1979	7.6	2.0	-5.1	13.7	15.7	-2.0
1980	7.9	6.0	-3.5	18.1	20.0	-1.9
1981	4.4	2.4	-0.6	22.0	22.0	—
1982	8.8	1.9	-0.7	22.3	19.3	3.0
1983	10.4	1.5	-0.9	22.2	21.4	0.8
1984	14.7	2.8	-0.8	26.1	27.4	-1.3
1985	12.8	8.8	0.3	27.4	42.2	-14.8
1986	8.1	6.0	-0.9	30.9	42.9	-12.0
1987	10.9	7.3	-0.9	39.4	43.2	-3.8
1988	11.3	18.6	-0.7	47.5	55.2	-7.7
1989	4.4	17.8	-0.7	52.5	59.1	-6.6
1990	4.1	2.1	-1.0	62.1	53.4	8.7
1991	7.7	2.7	-0.8	71.9	63.8	8.1
1992	13.0	5.3	-1.0	85.0	80.6	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

①从1978年起，本序列为国民生产总值。

②按当局定义的收入减支出占净物质产品或者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③单位为10亿美元，海关数字。

中国家甚至工业国家的高得多，只是比日本、新加坡等国的稍微低一点。除了储蓄率上升之外，80年代初以来一个最为明显的趋势是总储蓄的构成从国有部门转向家庭，尤其是，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以

及在家庭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自1979年以来急剧上升。1991年，家庭储蓄估计占了国内储蓄的40%左右，而农村家庭又占了家庭总储蓄的75%。这种高储蓄率无疑地有助于中国在改革时期成功地保持宏

表 2. 若干国家的债务与债务还本付息指数

	1980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外债对 GNP 的比率							
中国	1.5	8.5	11.6	11.3	10.7	14.2	16.4
阿根廷	48.4	70.5	76.4	66.5	119.1	62.3	49.2
巴西	31.2	43.7	42.3	34.3	25.6	25.2	28.3
前捷克斯洛伐克	...	12.0	12.8	14.4	15.7	18.6	29.5
匈牙利	44.8	74.0	77.9	69.5	73.7	67.6	77.0
印度	11.9	21.3	22.0	21.7	23.9	23.7	29.2
印度尼西亚	28.0	52.2	69.0	64.3	59.7	66.1	66.4
韩国	48.7	45.5	31.0	21.1	15.6	14.4	14.4
马来西亚	28.0	86.5	80.4	61.6	50.5	44.6	47.6
墨西哥	30.5	82.5	82.1	61.4	48.5	41.7	36.9
波兰	...	51.5	69.9	63.9	54.6	82.0	61.4
泰国	26.0	45.4	42.4	37.0	34.4	35.0	39.1
债务还本付息比							
中国	4.4	9.6	9.5	9.7	11.4	11.4	12.0
阿根廷	37.3	76.2	74.3	44.5	36.2	39.4	48.1
巴西	63.1	47.0	41.9	48.2	34.6	22.6	30.8
前捷克斯洛伐克	...	8.0	7.9	8.8	9.6	10.0	11.5
匈牙利	18.9	41.0	33.5	31.1	29.7	34.3	32.5
印度	9.3	32.0	29.4	30.3	27.6	28.3	30.6
印度尼西亚	13.9	37.4	37.1	40.4	35.5	31.1	33.0
韩国	19.7	26.7	32.3	14.8	11.8	10.7	...
马来西亚	6.3	22.2	21.1	24.7	15.6	11.2	8.4
墨西哥	49.5	54.2	40.1	48.0	37.9	27.8	30.9
波兰	...	12.8	14.2	10.6	9.4	4.9	5.4
泰国	18.9	30.1	22.0	20.2	16.3	17.0	1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债务表》1992—1993年。

观经济的平衡。

从政策观点看，有趣的问题是：高储蓄率到底反映了中国家庭的行为特征呢，还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就是说，是做为抑制型通货膨胀结果的“非自愿或者强制储蓄”。两者显然有着十分不同的政策含义。如果抑制型通货膨胀不严重，那么，放开价格之后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危险是有限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每个方面都有支持的论点。比如，人们可以争论说，最近以前，经济中一直存在对物价的明显控制。这种控制，加上已经出现的货币迅速扩张，已经导致了经济中强制储蓄程度的提高。再者，国家继续提供退休、教育、住房和卫生健康方面的福利，从理论上讲的选择储蓄的基本理由在中国是不大管用的。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这样争论说，由于中国出现了价格双轨制，在这个制度下，个人和企业可以自由地按市场价格买商品，持有货币或者储蓄不能视是“非自愿的”。而且，城市家庭由企业提供住房、

医疗卫生和养老金，农村家庭不同，他们要靠自己的储蓄来购买这类服务。农村储蓄率高还有一个原因，农村人有赚钱的投资机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放松对非农活动的限制之后更是如此。城市家庭相反，他们的资产组合，除银行储蓄存款之外，（最近以前）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对中国家庭的储蓄决策的性质进行的实证性研究，^① 远未就储蓄是否是和在多大程度上是“非自愿”的问题做出结论。有些研究论文，比如德西（1991年）的文章，以对抽样调查的答卷为依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强制性储蓄在城市家庭中明显存在，可能占了城市家庭储蓄的15—25%。而有关农村非自愿储蓄的证据似乎要少得多。

^① 费尔腾斯坦、利保和范文伯格等人（1990年）认为中国存在“强制性”储蓄，而钱（1988年）的结论是，数据没有否定这样一个假设，即储蓄率高是体制和行为发生变化的结果，并不代表非自愿储蓄。